

北京大学图书馆六十年

許世华

(一) 解放前的北京大学图书馆

北京大学图书馆创立于1902年。

同年1月，慈禧太后命令恢复京师大学堂。这时才开始设藏书楼，调取康有为强学会的藏书并从江浙粤赣湘鄂调来了各该省官书局刊本，同时采购了一批中外新旧书籍。藏书楼的地点在馬神庙（现称景山东街）大学堂（即院系调整前北京大学理学院）的后进。

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为国立北京大学，藏书楼改为图书部。1931年，图书部改称图书馆。1918年，图书馆迁到红楼第一层，后来迁到松公府，1935年迁到新建图书馆。与此同时，北大图书馆的组织机构由原来设藏书楼提调发展到1912年设图书馆经理，下分中籍掌书员和西籍掌书员，而后发展到设图书部主任一人，下分购书、登录、编目、典书四课，以及后来设馆长和主任各一人，下分事务股、购貯股、中文编目股、西文编目股、阅览股。

解放前北京大学图书馆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同时在中国文化教育发展历史上和保藏文化遗产上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但是，解放前反动统治阶级力图使它为自己服务，这样又使北大图书馆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受到了限制。

解放前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历史，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

1918年，即“五四”爱国运动的前夕，李大钊同志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部主任。这一年，毛泽东同志从长沙到北京来，曾一度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过。

李大钊同志在北大图书馆担任主任的五年中，十分重视通过报刊和杂志传播新文化，特别是传播马克思主义，介绍苏联的革命经验。1918年至1921年，北大图书馆订购的革命刊物，国内出版的有《新青年》、《劳动者》、《先驱》等，国外出版的有

《Soviet Russia》、《The New Russia》，《The Communist》等，总共有十余种之多^①。同时还采购了一批关于马克思主义和介绍苏联革命经验的书籍，如西文书有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等，日文书有《资本论》、《资本论大纲》、《马克思传》等。根据现有材料，1920至1921这两年所采购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介绍苏联革命的外文书籍共达四十余种之多^②。这个时期的北大图书馆，在李大钊同志领导下，在当时极端困难的环境中，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李大钊同志十分重视图书的流通，并坚决反对把图书馆当作藏书楼的旧传统思想。1919年，李大钊同志在北京高等师范图书馆成立二周年纪念会上讲演时，极力反对“文库式”的旧图书馆工作方法，反对管理员只是“不叫书籍遗失，就算尽了他们的职务，”“取书手续非常麻烦。”^③李大钊同志十分重视读者工作，除在《北京大学日刊》上经常通报新到杂志和书籍外，还尽量依靠读者群众来改进借阅流通工作，制订图书馆借书规则，规定借书逾期处理办法，并且依靠群众来与借书不遵守制度和久借不还的不良现象作斗争^④。1920年还特别开辟了介绍苏联革命经验的阅览室，该室除藏有中文书刊外还有外文书刊23种^⑤。1921年，在李大钊同志领导下，北京大学学生邓中夏同志等在校内发起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也曾设有专门介绍马克思主义和苏联革命经验的图书馆。

① 《北京大学日刊》（以下简称《日刊》，1918年至1921年。

② 《日刊》524号，1920年1月26日；566号，1920年3月19日；568号，1920年3月22日。

③ 《平民教育》1919年12月13日。

④ 《日刊》108号，1918年4月11日；795号，1921年1月25日；825号，1921年3月8日。

显然，在“五四”爱国运动的前后，以李大钊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利用北大图书馆传播新文化特别是传播马克思主义，介绍苏联革命的经验，对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解放前北大图书馆的光荣革命传统也表现在“矛民图书室”的创立这件事情上。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群众迫切要求了解当前的革命形势与任务。在此形势下，北大广大学生迫切要求建立革命的图书室。在学生自治会几次要求学校当局订购革命书刊都遭到无理拒绝之后，1947年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大学的地下组织便决定创办革命图书室，配合革命形势进行革命宣传工作。1947年10月21日，“矛民图书室”正式成立。图书室设在红楼167号，后迁104室，再后迁160室。图书室由地下党宣传部领导，党派了地下党员并团结一批进步群众在那里坚持工作。为了便于与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进行公开合法的斗争，一方面以北大故校长蔡矛民先生的名字来命名图书室，并在图书室的“组织大纲”中规定：“本兼容并包之精神，收集各种书籍，以培养自由研究之风气，发扬民主与科学之传统为宗旨”，以便同国民党反动派在文化战线上的统制与迫害进行斗争。另一方面，则以学生自治会附属机构的名义作为活动上的掩护；同时又聘请了三十多位教授担任图书室的导师，以扩大斗争的力量。“矛民图书室”藏有《共产党宣言》、《列宁主义问题》、《中国共产党党章》、毛泽东同志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党的报刊《群众》、新华社编的《时论选辑》、伪装书《毛泽东论工商业政策》（封面题为《秉烛后谈》）等革命书刊，此外还有许多苏联文艺书籍，如：高尔基的《母》、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在“矛民图书室”成立一周年（1948年10月21日）时，图书已达到5,000余册、杂志百余种，^⑤以后逐渐增加到一万余册。

“矛民图书室”的成立，得到校内外广大群众的热情支持。校内的许多师生职工和社会上的进步人士都踊跃捐赠图书，一些北大图书馆员也积极帮助图书室开展工作。

“矛民图书室”通过革命书刊的宣传流通，有力地吸引了校内外的广大读者。它不仅在党的宣传工作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同时在为地下党培养干部方面也作了贡献。图书室团结了八十位同学参加该室工作，仅仅管理股就有四十二人。图书室的工

作干部在斗争中成长，有的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有的陆续前往解放区工作。解放后，这个图书室便并入了北大图书馆。

除此之外，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大学的地下组织还在校内设立过“五四”图书室。北大的一些进步分子曾建立过其他进步的小型图书室。

在反动统治的黑暗时代，北大图书馆在保藏文化遗产和传播知识方面作出重要贡献。

1902年，北大图书馆建立时，有中外文图书78,000册，经过四十六年，到解放前夕1948年12月，全部藏书达到724,894册。1950年底院系调整时接收了与之合并的燕京大学图书馆的藏书403,221册，总数即达1,128,115册。藏书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有用的书刊和为数不少的善本书籍，包括1903年由清朝藏书家方大登捐赠的碧琳琅馆的大宗藏书（其中有从日本佐伯文库收回的珍本）；1937年购入的北大故教授马隅卿先生收藏的小说戏曲书五千余册（其中秘本颇多）；以及后来购入的清末民初著名藏书家李盛铎木犀轩的藏书五万余册（其中宋元刊本稿本精钞本及明清善本甚多）；旧燕京大学搜集的各省地方志与清末史料等。在这些善本古籍中，除文史政治经济类之外，还包括科学技术特别是医学的重要文献。在外国珍本书籍中则有：耶稣会通信以及印数仅有一百部的关于菲律宾的历史等。此外还有一批中外文期刊，如：原版《新青年》的全部，缺期较少的《东方杂志》，巴黎公社出版的刊物，以及1848年出版的一百年来从未脱期的《英国化学会志》（Journal of The Chemical Society），都是十分珍贵的。

北大图书馆经历了北洋军阀统治的动荡时代，抗日战争敌伪占领的混乱时期，国民党反动派崩溃时期，它的藏书都没有遭受大的损失，基本上是全部保存下来了。这固然有种种原因，但也是和北大图书馆广大职工的努力分不开的。例如，解放前夕，为了粉碎国民党反动派企图劫走善本书籍的阴谋，北大图书馆工作人员曾编辑了两种《李氏书目》，而以一种许多好书没有列入的书目来应付国民党反动派。在解放前夕，许多图书馆工作人员和师生员工一道在北大地下党领导下，积极参加了保

⑤ 《日刊》766号，1920年12月11日。

⑥ “矛民图书室”成立周年纪念晚会纪录。

护学校财产反对盗窃破坏的斗争，从而对保护北大图书馆藏书的完整，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解放前四十多年内，北大图书馆在传播新文化和新知识方面，曾经作出重要的贡献。北大的许多师生，在中国革命事业和科学文化事业上发挥过很大作用。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从北大图书馆吸吮精神乳汁，滋养和壮大自己，许多革命家和学者都曾从北大图书馆得到益处。“五四”时期的《北京大学日刊》经常刊登一些著名学者对北大图书馆工作的建议。显然，他们对北大图书馆的关心以及提出种种要求，正是说明这个图书馆曾为他们提供许多有用的图书，帮助他们进行学术研究。

解放前的北大图书馆存在着另一方面的情况，即反动统治阶级控制这个图书馆，力图利用它来为自己服务，因而使这个图书馆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不能不受到限制。

自从1922年12月李大钊同志离开北大图书馆后，这个图书馆的变化真令人有隔世之感。革命的、进步的书刊减少到几乎绝迹，例如1924年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北大图书馆的第三院阅览室共有中文杂志54种、西文杂志13种，其中只有革命刊物《新青年》一种^⑦。国民党反动派掌握政权之后，1929年10月，北大图书馆第一院第三阅览室的58种中文杂志中，除了《语丝》还存在外，已经看不到更多的革命的或进步的刊物了^⑧。根据历年入藏新书的目录考察，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真如凤毛麟角。

解放前北京大学就是一个综合性大学，理科学院与文科院系并列，在比较晚近的漫长时期内，分文、理、法、医、工、农六个院，而北大图书馆收藏的自然科学图书，在全部馆藏中不到20%。这表现反动统治阶级的腐朽性和对科学事业的蔑视态度。

反动统治阶级不会也不可能关心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解放前，北大图书馆和其他文化教育机关一样遭到极其悲惨的命运，不是学校经费无着落，便是经费打了折扣。1922年1月的《北京大学日刊》上有一则启事：“现由教育部领到一个月的四分之三经费，”通知教职员来领取一个月的四分之三的薪金。当时，有少数教授因学校不能按期发给薪金便扣住图书馆的图书不还。难怪乎在1929年10月创刊《北大图书馆月刊》说到北大图书馆的情况时，便写出无限的感慨：“不幸十几年来，本校受军阀的

蹂躏，风雨飘摇，不绝如缕，因此本馆不但不能买书，连现状都不易维持，所有一切进行的工作，都于无形中停顿了。”1929年北大学生会拟的《发展北大计划大纲》也有类似的描述：“北大购买图书及仪器，向无一定经费，故历年购置，多所忽略，为发展计，实有固定经费额之必要。”在此以后的情况，并没有比过去好多少，加上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特别是在崩溃前夕，货币不断的贬值，这就更加严重地影响了北大图书馆的发展。

虽然如此，北大图书馆员们的长期辛勤劳动，为人民积累了许多有用的珍贵的图书，也制订了若干至今仍然有用的规章制度，他们在长期工作中所积累的经验，更是极其宝贵。但是，他们献身于图书馆事业的崇高理想，也只在人民革命胜利之后，才有可能充分地实现。

(二) 解放以来的北京大学图书馆

解放后，北京大学成为人民的北京大学。北大图书馆在党的领导、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根据党的方针政策，积极配合教学、科学研究和各时期的政治运动开展图书工作及读者工作。旧的为反动统治阶级所控制并为其反动统治服务的北大图书馆发生了根本转变，它已成了为无产阶级政治、无产阶级教育事业服务的新的北大图书馆。

北大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自解放以来，积极参加各项政治运动和政治学习，认真地进行自我改造，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树立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在这个基础上，全馆进行了关于党的教育方针和我国图书馆事业的方针任务的学习和讨论。特别是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鼓舞，同志们的政治热情与工作积极性更加提高，前进的方向更加明确了。

北大图书馆的图书建设，无论在质方面或者在量方面，在解放后的十几年中都有着极大的发展。1902年北大图书馆成立时仅有中外文图书78,000

^⑦ 以上见《日刊》1378号，1924年1月5日；1382号，1924年1月10日。

^⑧ 《日刊》2265号，1929年10月26日；2266号，1929年10月28日；2268号，1929年10月30日；2269号，1929年10月31日。

冊，經過將近半世紀的時間，到北京解放前夕（1948年12月）才發展到724,894冊，如加上1950年底燕京大學的藏書403,221冊，共計不過1,128,115冊。可是，解放後1949年到1961年底，僅13年時間，北大圖書館的藏書已達到了2,379,848冊，而且有幾十萬冊散本期刊尚未計算在內。這也就是說，解放後13年的藏書量（不包括幾十萬冊散本期刊）比解放前47年的藏書量增加一倍以上。至於馬克思列寧主義書籍，如前所說，在解放前北大圖書館的藏書中寥若晨星，而今天館藏馬克思列寧主義書籍已有大量的增加。如就1959年購入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3,238冊與解放前一般每年充其量不過採購3或5冊的情況比較，就是千百倍的增加。再從館藏自然科學書籍的情況來說，解放時館藏自然科學書籍未達到館藏圖書總數的20%，現在自然科學書籍每年進書量達到占每年全部進書量的50%以上，大大改變了解放前採購圖書的偏頗現象。再就期刊的採購來說，1917年北大圖書館仅有外文雜志79種^⑨。以後的情況並沒有大變化，正如1929年北大学生會擬的《發展北大計劃大綱》中所指出“往昔購買圖書，限於旧用之課本，新近出版書籍雜志，多未購置。”解放後，北大圖書館訂購的外國雜志逐年增加，1961年訂購外國雜志達1,665種、2,937份。如中外雜志合計起來，1961年共訂購2,819種、7,466份，為現有檔案可查的1935年訂購中外雜志400余種^⑩的7倍。解放後，善本書也繼續有所增加。

在讀者工作方面。解放前47年中，關於圖書的介紹工作，除了李大釗同志擔任圖書部主任的五年中，經常在《北京大學日刊》上刊登新書通報外，幾十年中編制的書目索引等，充其量不及20種。至於舉辦展覽便更少了。解放後，特別是大躍進以後，北大圖書館除了每學年開始時向新同學介紹圖書館的概況及借書辦法之外，經常編輯書目並舉辦展覽。如1958年，大躍進以前的幾次較重要的展覽，有：《紀念斯大林逝世展覽》、《我國第一個五年計劃展覽》、《革命文獻和現實主義文學善本書籍展覽》。1958年至1959年，編輯專題書目12種，舉辦《我國十年偉大成就》和《社會主義陣營萬歲》兩個大型展覽，其他中小型展覽34次。1960年，編制書目16種，與有關各系合作舉辦《紀念列寧誕生90周年》和《迎接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的出版》兩個展覽。1961年，與有關各系合作舉辦《中國共產黨成立四十年》、《中文

歷史兩系同學用書》與《無產階級貧困化》等圖片和書籍展覽。這些書目和展覽的主要特點，是密切配合當前政治運動、政治學習、教學和科學研究的。例如《館藏列寧著作目錄》、《館藏毛澤東著作目錄》、《館藏中共中央領導同志著作目錄》、《學習列寧主義萬歲三大文件的書刊資料目錄》、《西藏問題圖書資料索引》、《全國各大專院校學報有關教學改革資料索引》、《1959年全國各大專學校學報索引》、《英國近代文學史書籍目錄》、《中國語法書籍目錄》、《李商隱問題目錄》等。至於閱覽室情況，解放前全校師生平均每10人有閱覽座位一個，今天學校師生人數大大增加，平均每6人有閱覽座位一個。再就閱覽與借書情況來說，根據現有資料，1929年4月至1932年4月每日借出書籍，少的只有4冊，最多的不過271冊，一般是30至40冊左右。^⑪而1961年借出圖書661,529冊，除停止借書的假日外，平均每日借出書籍2,000冊以上，較之1929年至1934年這一段平均每日借書冊數，以數十倍計；而且借書數字還在上升，今年上半年6個月借書就達407,932冊，半年內平均師生每人借書30多冊。

再就館際協作方面來說，解放後北大圖書館在圖書互借、交換和調撥等方面也作了很多的工作。現在北大圖書館同200個國內圖書館建立了圖書互借關係，同49個國家的217個單位建立了刊物交換關係，其中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共74個單位。1952年院系調整至1961年，陸續調撥了20余萬冊圖書支援兄弟民族地區、老解放區和其他各地圖書館，其中包括《永樂大典》抄本、《清實錄》、《唐蕃聯盟碑》拓片等珍貴圖書。

北大圖書館從解放以來，特別是在1958年以後，在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光輝照耀下，館員思想水平進一步提高，在總結過去經驗的基礎上，不斷改進工作，從學校的教育任務出發，積極主動，有的放矢，克勤克儉地提高服務質量。具體的辦法和步驟是：

首先大興調查研究之風。通過學校和各系黨政領導、系圖書資料室、師生讀者了解他們在政治學習、教學和科學研究中對圖書的需要情況，以此為根

⑨ 《日刊》1917年11月至12月。

⑩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概況》(1935年)

⑪ 《日刊》，1929年5月至1932年9月。

据查对馆藏图书，以便有的放矢地补充与供应图书。

在調查研究的基础上，1959年制訂了《三年图书建設规划》，并付諸实行。1961年根据以教学为主的原則，对各系学生所需教学基本参考书进行了普遍的調查，并根据調查的結果制訂待购目录，进行采购，使图书建設的目的更加明确，采购工作更有計劃。

其次是在調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以教学为主的原則，抓住教学的主要环节，切合需要地供应图书。除一般經常借出图书外，初步开展下列新的工作，即每学期主要抓三个环节配合教学。第一、在学期开始时，抓課程的必讀參考书，根据各班同学人数比例配备基本参考书，分別分配到班或存放閱覽室等待借閱。第二，在学期中間，抓課堂討論和教学实习等学习重点，按照需要情况、使用时间和各班人数，采取多种办法，进行供应。第三，抓期終考試。根据考試課程所規定的必讀參考书（包括報刊論文），采取个人借閱或按人数比例，集体借書等办法供应图书。这样，不仅貫彻了以教学为主的原則，而且配合了教学的重点。对于各系科学研宄，图书馆积极主动、有的放矢地对一些重大研究項目，进行重点配合。例如中文系編写和修改《中国文学史》时，图书馆把所需要的图书（包括善本书）和旧期刊調到第二閱覽室，并开辟研究室，派館員进行專門性的服务。

为了有的放矢地配合各专业的教学和科学研宄，图书馆設立了三个专业閱覽室，分別为語文、历史、图书馆学各系，哲、經、政、法各系及理科各系服务。各专业閱覽室的館員職責分明，供应及时，大大便利了各系各专业的教学和科学研宄工作。

第三，有步驟地开展参考諮詢工作，配合教学和科学研宄。1958年，为了配合科学研宄大跃进，图书馆曾成立“目录諮詢小組”，专门帮助师生解决查目录方面的問題，直到把书借到为止。1960年起，在新生入校时，采取展览方式，組織新生來館參觀，向他們介紹图书馆情况，介紹查找資料、借閱图书的方法和手續。最近，则逐步开展关于工具书使用方法的介紹，如对历史系世界史專門化和西語系部分师生讲解外文工具书的使用方法，便是一个例子。

第四、积极主动地配合全校重大政治学习运动，如《毛澤东选集》第四卷出版时，除采編部和期刊部积极采購該书和有关图书之外，并与政治系、历

史系合作举办了《第三次國內革命战争图片展覽》，与有关各系合作編輯《学习毛澤东选集第四卷資料索引》、《第三次國內革命战争时期参考資料》、《有关第三次國內革命战争时期文学作品参考书目》，还設立了“学习《毛澤东选集》第四卷 閱覽室”集中供应有关的图书資料。列寧誕生九十周年 和“列寧主义万岁”等文件出版时，图书馆也进行了一系列图书宣传工作，配合全校的学习。

第五，为了挖掘图书潛力和使全館工作更加条理化而进行各项整頓工作。

北大图书馆由于过去历史上的种种原因，造成图书目录紊乱多头的情况。1959年底在全校跃进誓师大会之后，开始对旧分类目录进行查对，改排和拆片的工作。原估計要一年多才能完成的工作，經過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結果在两个多月的时间內就完成了改排卡片三十五万余張的工作。1960年又完成了十万余張旧燕京大学图书馆两种书名片的合并工作。这一年暑假之前，又組織一部分館員与本校图书馆学系师生八十余人合作改組目录，按照最新的大型图书分类法完成了主要图书十三万張卡片的改編工作。这是北大图书馆图书目录的重大改变。1961年又进一步檢查和整理了分类目录卡片，整頓了各系藏书的目录卡片，要根据期刊目录查对了所有期刊。

最后，大力开展旧书刊的整理工作。解放前北大图书馆遺留未編目的有书籍三十三万多冊及大量期刊；解放后收集到的大量旧书刊也尚未整編。解放以来，先后整理了书刊八十多萬冊，大部分做出了书名目录和著者目录，一部分做出了分类、书名、著者三种目录。特別應該提出的，是整理了解放前的革命文献資料共1,441种，1,807冊，其中許多是十分珍貴的，如毛澤东同志主編的《湘江評論》原版一至四期及临时增刊，《湖南自修大学創立宣言》等。中文、日文旧期刊的整理工作已全部完成，俄文旧期刊的整理工作今年即将完成，除为它們編制了字順和分类目录外，还編出中文旧期刊的缺期目录和交换目录，分送国内各大图书馆，要求互相交換，以期调剂余缺，各自配套成龙。

北京大学图书馆全館同志将进一步继承并发扬过去的光荣的革命傳統，努力改进全館工作，使北大图书馆在配合学校教学和科学研宄方面，发挥更加巨大的积极作用。